

新质生产力的人文关怀

史少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6)

[摘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时代呼唤的顺应,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的创新发展。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是引领科技发展的动力。智能化、数字化是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引擎。然而,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利,控制不当也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所以,我们要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质”,给予新质生产力以人文关怀;关注科技创新的双面性,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安全基础;关注科技伦理并且完善科技立法,保障新质生产力在正确轨道上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更快发展;加强世界性交往,促进新质生产力长足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人文;关怀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5.008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中国打造发展新动能优势的客观要求,是顺应世界经济形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必然选择。创新是引领科技发展的动力,能够催生新动能、新模式、新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时代呼唤的顺应,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的创新发展。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要给予新质生产力以人文关怀。

一、关注科技创新的双面性,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安全基础

“当前,世界各国都卷入了一场革命浪潮——技术革命浪潮。”^[1]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对这一潮流的顺应。我国新质生产力凸显“质”的提升,不是仅仅关注GDP,“追求量的提升”,更是“追求质的提升”。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的飞跃提升为核心标志。智能化、数字化是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引擎。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的主导作用,具有高效能、高科技等特征,然而,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利,其副作用控制不力也会带来灾难。由此,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但提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更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

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2]

确保安全基础,关注科技的两面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很多案例可以体现出来。例如人工智能(AI)为人类带来了个性化、智能化的便捷应用,同时也给人类制造了危险,因为无人驾驶失控、机器人失控等事故也时有发生。特斯拉汽车公司工厂的一名工程师,在给机器人编程时突然遭到后者的攻击,导致严重受伤。而该公司的CEO即是引领世界科技创新的巨头——埃隆·马斯克,他曾给予人类预警:人工智能或将消灭人类。马斯克强调人工智能的危险性比核武器大得多,其能力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而且它正以几何级数在进化。马斯克认为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对新兴技术进行规范,人工智能将对人类构成威胁。科技的不安全性还在别处有体现,如《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序中所言:“当代的科学和官僚机构为我们提供了中央供暖和全球变暖,两分钟即做好饭菜的微波炉和潜伏期为10年的克一雅二氏病病菌。世界的奇观壮景每增添一点,世界上的恐怖事物也增加一些,从进食具有潜在危害的肉类,到在阳光照耀的污染海水中游泳,生活的每个领域中都是如此。”^[3]新质生产力就是规避风险的生产力,是抵制、限制新兴科技的副作用的生产力。我们力图利用新兴科技有利于人类的方面,规避新兴科技有害于人类的方面。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就曾表示,强大人工智能的崛起,对人类来说,可能是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要未雨绸缪,加强战略研判,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4]

加强对数字化转型以及技术创新的投入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之一,我们必须重视绿色技术自主创新的突破,将高效率、低消耗等绿色生产方式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升级相融合,并且完善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的评价体系,高度重视社会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和个人人身财产安全,推动每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好处,但也伴随着新的风险和挑战,也会使得风险的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然而,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阻止科技的进步和发展。相反,我们应该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积极应对风险和挑战。这需要政府、企业、学术界和其他社会人士共同努力,制定合理的政策,加强科技监管和风险评估,推动科技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说,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要时刻关注创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及时对新兴科技进行规范,预防新兴科学技术的滥用,每一位科学家、技术工程师,甚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深刻体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防止新兴科技损害人类利益的消极后果发生。

二、关注科技伦理并且完善科技立法,保障新质生产力在正确轨道上发展

伦理的含义颇多,一般认为“伦理”即人伦道德之理,而科技伦理一般指科技活动中的行为规则,其中,尊重人类尊严原则是科技伦理的主要原则之一。爱因斯坦说:“人类所思所做的一切都与满足内心深处的需要和减轻苦痛有关。……但科学家却一心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5]卡拉姆昌德·甘地把“没有人性的科学”列为七种毁灭人类的行为之一。诚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处;然而,如果对其缺乏道德的约束,就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基因工程等的无限制研究及其对技术丧失人性的滥用,有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冲击以及灾难。故而,任何科技的发展,都应维护人“类”的尊严。康德说过:“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须服从这样的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6]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能够设定、规划、追求自己目的的主体,并且能够基于自我尊严而谋求发展。人类的存在,具有一种固有的、客观的价值属性即“尊严”,并且这种属性,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意义。正如康德指出:

“目的王国中的一切,或者有价值(Preis),或者有尊严(Würde)。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7]任何物件都可以用价值尺度衡量,可以替代、可以交换,然而人是具有道德意识、道德意志的自主个体,人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理性的社会的存在,人的尊严超越一切价值之上,这种价值具有一种独特的形而上的属性,没有可替代的等价物。由此,“把‘尊严’看作一种本体论上的独特的价值属性的见解是一种典型的价值实在论”。^[8]西方科技伦理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源于康德关于尊严的理论。可以把“联合国文件中对‘尊严’的使用看作它的这种当代观念的特性和重要性的一个例证。在联合国文件中,人类尊严频频被说成是对人权的证成。……《联合国宪章》也把尊严和价值联系在一起”。^[9]其实,在康德的各种著作中,出现“尊严”的词汇百次以上,其含义虽然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著作中,康德始终都把‘尊严’解作‘崇高’和‘(最高形式的)高度’。……康德时常讨论的都是所有人类存在者的尊严,或者——按照他常用的表述——‘人性的尊严’”。^[10]当科技发展挑战人“类”的人性、人格尊严的时候,科技伦理也随之产生。“对主体世界来说,社会世界的结构与文化的变化,比世代交替的步调还要快。在个体的生命历程当中,社会世界不再是稳定不变的。这对身份认同的模式与主体形式带来深远的影响。”^[11]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必将面临全球性的科技伦理治理问题,因为“主体正是应该从他自己身上汲取其行动的资源,汲取道德和政治的资源,没有它们,他就无法在社会生活,亦即无法活着”。^[12]

科技伦理是时代的产物,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技伦理的治理也会随之变化。远在古代,人类就开始思考科技发展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古希腊时期,关注了医学伦理的著作《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例证。二战后期,由于世界核战争的阴云,关心人类前途的部分科学家开始探讨科技伦理,随后关注科技伦理议题的群体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后,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探讨的热点伦理话题。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普及,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与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基因技术、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许多跨时代的新发现,进一步将科技伦理的探究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高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尤其是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科技探索应用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张力也愈发凸显。在全球科技发展浪潮之下,世界各国也都更加关注科技伦理。联合国在1975年通过了《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和平并造福人类宣言》,强调世界各国应该将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运用到造福人类的和平事业。新时代的新质生产力赋予人们改变世界力量的同时,也会改变人自身。与之伴随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类在匮乏、贫穷、残障、疾病、无知等所有不利的自然情境中逐渐超脱,让人类自主的、自由的生活超越了诸多约束限制,甚至能让人自主决定性别与基因。吉登斯说:“科学已经全球化,公开化,并基本上是无法控制的了。科学事业并非简单地服从于心猿意马的商业利益,没有人知道科技创新将把我们引向何方。”^[13]其实,马斯克也早已将研究领域投向了人工智能。不过马斯克研究的主旨是善意的,他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让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从而解放人类的生产力,而且能够为人提供感情、生活方面的各种服务,甚至还可能提供生育服务。这意味着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人形机器人妻子、人形机器人丈夫即将问世。如此一来,被赋予了情感、生育能力、繁殖能力的人形机器人,是否会出现伦理问题?新时代的世界,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推进创新,如果将来某一天智能的人形机器人与“类”看上去无任何差别,人“类”也无法辨认哪个是机器人、哪个是人“类”之人的时候,那么就会引发这样发人深省的哲学思考: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人“类”的伦理又是什么?故而,科技伦理治理是世界科技发展也是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20世纪60年代,医疗技术领域取得了对生理规律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医疗、生物方面的科技伦理议题就已经为世界所关注了。当今时代,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很有可能会改变人类本质,使现存的社会秩序受到极大挑战。如何保持“人”的“类”本质,也是我们面临的议题。总之,当前科技伦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创新、医学创新、生命科学创新等领域。有学者把科技伦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然”方面的研究,即分析科技发展中凸显的伦理问题;另一类是“应然”方面的研究,为未来科技的发展提出应对政策、策略等。^[14]

“伦理的力量是理性的力量,……把伦理造就成一种效力这个政治问题在于怎样把理性辩护落实到社会之中,而这个问题只能有威权式的解决方案。”^[15]世界各国为了反对有违伦理道德与科学精神的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纷纷设立相关法律。“对法律的道德性之要求的遵循可以服务于更为广泛的人生目标。这一要点来自于法律的内在道德中所蕴含的对于人的理解。……人是或者能够变成一个负责的理性行动主体”。^[16]我国法律也在为科技伦理护航,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三百三十六条中就有关于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罪名。另外,数字化传递不仅涉及伦理道德问题,而且也产生了威胁国家安全等问题,“计算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犯罪机会。个人计算机终端和分布式处理的迅速普及,使各级白领工人更容易进行高技术偷窃。于是,新技术使白领犯罪普遍化,因为新技术甚至使身份最低的程序员,或操作员都能参与各种曾几乎被最高管理部门当作禁区的非法活动。”^[17]故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要重视科技伦理的治理,而且也要完善科技创新方面的立法。社会文明是人类的力量以更加完善的方式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外部物质世界以及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的结果,“当伦理发展的结果产生了道德体系时,就出现一种法律发展的阶段”。^[18]科技伦理不断发展,科技创新方面的立法也逐步完善,就会保障新质生产力在正确轨道上发展。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要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无人机、服务机器人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19]由此方能促进新质生产力更健康地发展。

三、调整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更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和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准则等问题。”^[20]伴随创新性科学技术的不断涌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致部分工人失业,进而造就人们的经营方式、劳动方式的巨大改变,也会带来部分的分工的变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势必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的变革。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会随之变化,生产关系的总和为经济基础,那么,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变革。故而,及时疏通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改革、调节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方面,深度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更快发展。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新的前所未见特点和职能的管理机器的出现,开创了机器技术发展的新阶段,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生产自动化和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的时代。”^[21]未来人工智能的不断创新,将用自动化操作去处理许多重复性的繁琐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人的工作效率,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更有创造性和战略性的工作: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大量的数据,并提供准确的预测和建议,从而帮助人们作出更明智的决策;人工智能将应用于客户服务、医疗保健等领域,提供更快速、更准确的服务,从而提高服务质量;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为新的商业模式提供可能性,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或风险:可能导致就业

岗位减少;人工智能大量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可能造成隐私泄露以及安全风险;人工智能如果训练数据存在偏差,那么其反馈系统也可能会产生不公平、偏见的结果,从而形成算法偏见;如果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有可能会使得人类技能弱化,并且也存在出现意外后果和技术失控的风险。也就是说,新的技术发展,一方面会减少对人的劳动需求,使部分人失业,还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风险和技术失控风险;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改变人们的工作模式,如“安排灵便工越来越普遍。这也创造了工时的新模式——短时工作周,灵活工作时,甚至灵活工作年”。^[22]人工智能代替人的体力劳动,会使得工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是资本家攫取更大利润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则不同了,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新生产关系的确立,使用技术的社会形式、性质,社会经济作用和后果都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技术手段构成固定生产基金的积极部分。这就是使用技术的独特社会形式;技术作为人的助手起作用,目的是减轻工人的劳动,使劳动健全化并变得愉快,提高劳动的成效。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技术的使用也可能引起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另外的性质,不是对抗性的矛盾。”^[23]即是说,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状态中,有不同的社会经济职能、不同的社会形式及不同的用处。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效率提高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同时,又是生产关系的客体,而这种生产关系决定着所使用的创新技术的性质与社会形式。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新质生产力,才有可能防止新型科技的异化出现。“只有理解在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化过程和物质技术基础发展之间的辩证相互关系,才能制定出共产主义建设中有科学根据的经济政策。”^[24]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释了私有制是产生异化的根源的思想,即私有制废除,异化劳动就会消亡。异化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难以克服、难以逾越的矛盾,这种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有时得到暂时的缓解,但这种矛盾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当社会主义经过不断发展直至废除了私有制,就会改变社会分工的强迫性和自发性,社会分工就成了公有制下的合作式的分工,这样的分工就不会构成产生异化的根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使用机器技术的目的,原则上是另一种情况,它是以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名义被使用的。所以,当我们说到社会主义条件下使用机器的经济界限时,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它们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可比拟的广阔。”^[2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了让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应该从这些方面进行调节和完善: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立和完善适应新质生产力特点的产权制度、市场规则、法律法规等,政府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促进生产关系的优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其二,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及时进行社会组织变革,合理配置资源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不断提升企业对新技术、新模式的整合能力。其三,发展新质生产力往往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由此政府和企业可以加大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推动教育模式改革,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and 实践能力,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以适应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要求。另外,不断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及时关注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和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四、加强世界性交往,促进新质生产力长足发展

21世纪以来,世界掀起了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浪潮,推动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升级和拓展,并且赛博安全、区块链技术、量子科技等突破性技术不断演进,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世界科技竞争日益激烈,高新科技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在全球性技术扩散的过程中,我国也及时地抓住了机遇,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整体科技水平快速提升。然而,我国的高新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如果只是依靠引进国外技术,永远会被别人牵着走,所以必须自立自强,发奋攻坚,只有自己突破创新性科技难题,才有可能开发出世界一流的高新技术产品。我国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正是在于鼓励原创性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虽然新质生产力发展强调自主创新,但也不应忽视世界性交往。因为封闭式的发展是不现实的,也会限制自身的进步,还违背了全球化的潮流。“‘全球化’这个概念并不是最近才有的。这个词似乎最早出现在1929年的比利时”,^[26]而且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为了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必须独立自主、奋发图强,但也不能忘记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自身创新性发展。在当今世界,美国“保护‘国家冠军’的政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更加困难”,^[27]如此下去,就会影响世界性的经济交流,而全球性的经济交流受阻是危险的,正像吉登斯所说:“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28]尽管如此,“日益全球化的趋势多少迫使着国家间在那些以前它们可能更愿意单独处理的问题上持合作态度。”^[29]全球化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些世界性的问题例如生态环境保护等需要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汤因比很早以前就讲过:“现在的人类或者说当前的文明正经受着巨大挑战,核武器这样的恐怖武器,以及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暴增这些问题,以国家为单位或是只依赖一定地域内的国家间的合作都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要以全球化的形式进行处理。”^[30]

强调独立自主创新高新技术,并非闭关锁国。因为自我封闭容易成为井底之蛙,难以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31]故而,我国应加强世界性交往,突破科技发展的壁垒,在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自主创新科学技术。尽管前进的道路坎坷,然而我们要有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主创新的自信,在争取更多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条件下,促进新质生产力长足发展。汤因比和罗素等哲学家都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乐观看法。其实,对于未来的发展,任何人也很难作出确定性的预测,因为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成就,成了全球重要的增长引擎之一。然而,未来的发展形势是复杂多变的,不仅仅取决于我们一个国家的自身条件,还会受到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也会面临环境问题、社会不平等、技术变革等各种挑战,这些都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来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我国加强同各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促进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所以我们要以开放、包容和合作的态度面对未来,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

五、总 结

人是新质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而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为人文目标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方式。保持新质生产力的安全基调,更好地为全体人民造福,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绿色、质优,故而应该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以及完善科技立法,保障科技的安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

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会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会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及时调节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方面,深度进行体制改革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强调自主创新,但我们也要开阔眼界,加强国际交往,继续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更快发展。

注释:

[1][17][22][27][英]汤姆·福莱斯特:《高技术社会——信息技术革命史话》,姚炳虞、郑九振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1、371、360、409-410页。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19834.htm。

[3][13][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8-19、89页。

[4][19][20][3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418、418-419、418、184-185页。

[5][美]爱因斯坦:《我的世界》,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5、19页。

[6][7][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6、87页。

[8][9][10][德]奥列弗·森森:《康德论人类尊严》,李科政、王福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221、222-223、264、266页。

[11][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9页。

[12][比]米歇尔·梅耶:《论道德和政治的无礼》,史忠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2页。

[14]李秋甫、李正风:《科技伦理治理的“差序格局”与“错序格局”》,《科学学研究》,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2R7H8JGA7Ex2OmMBsqGSLRbetzDNjzpGY1RImoKXC70fJSPfxhN=mLARyV7aZBCINS03kfhD_UF41Q8ap7VVC8txC6CIJLRFwWHxa8I7VqdLisPZ1NCKPOtfj7MGecxWRJLYA8oYrdQ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15][英]B·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9页。

[16][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88页。

[18][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页。

[21][23][25][苏]尼·阿·洛赫马涅柯:《技术进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五茂根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10-11、27-28页。

[24][苏]C.C.伊林、〔保〕H·波波夫主编:《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化》,陈光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26][美]马克·莱文森:《全球化简史》,方宇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3页。

[28][2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10、147页。

[30][日]山本新等:《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吴栓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3页。

[责任编辑:刘毅]